

灭佛首辅李德裕

李德裕，在唐王朝时历仕穆、敬、文、武、宣宗诸朝，在唐武宗时，位极人臣，走到了政治生涯的顶峰。他是一位颇有建树的政治家、军事家，同时又是一位无法摆脱“党争”的政客。他在党争中发迹，也在党争中败亡。

远 山

李德裕是中晚唐一位杰出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。他力主削减冗繁的官员，反对政出多门，平定了南昭的叛乱，打败了扰边的回鹘，协助唐武宗发动了惊世骇俗的灭佛运动，使唐武宗时期出现了虽然短暂但却巨大的辉煌。然而李德裕又是一个不幸的人物。他出身于宰相之家，自己也做到了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首辅。但他所处的时代“党争”激烈，政客们拉帮结派、相互为谋私利而勾心斗角、互相排挤、互相打击。他在言论上、特别是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强烈地反对结党拉帮，而实际

上，他却是“牛李党争”中李党一派的代表人物。为派内人员谋取私利，这就是党争的最高原则。因此，哪一派掌权，哪一派的人便鸡犬升天，反之，则被打翻在地再被踏上一只脚。李党掌权时，李德裕对牛党的人虽也有手软之时，但总的来说是毫不留情地排斥打击，而当牛党最终又爬上了权力的顶峰时，李德裕的政治生命和生理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。毋庸置疑，李德裕的身上既闪烁着耀眼的光芒，也散发着深陷党争“

的人物。

李德裕，字文饶，赵郡（今河北赵县）人。小时，他读书就很用功，到了20来岁时，才华就很出众了。由于他父亲李吉甫位居宰相，在这样的家庭出生，他是很矜持的，不愿意和一般读书人那样去通过考试做官。好在那时有这样一种制度，即父祖有功，便可给予子孙当官的权利，这种制度谓之曰“荫”。因此李德裕虽然不屑于和一般读书人一起参加考试，他还是当官了。他先当的是校

书郎,后被同样因“荫”而当上官的河东节度使张弘靖召为掌书记,之后又当上了监察御使。

李德裕素有大志,小时就很出名了,连皇帝唐宪宗对他都宠爱有加,将他抱来坐在膝盖之上。当时的宰相叫武衡,听别人吹嘘李德裕,也是出于好奇,便把他叫了来,像现在的大人爱问小孩那样,问李德裕在家读什么书,读书的情况怎样之类,意思也在于了解李德裕有些什么样的志向。不料李德裕任武衡怎么样问,他就是闭口不答,弄得武衡很下不了台的。第二天,武衡遇到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,便将此事告诉了他,并开玩笑说:他是不是耳朵有问题啊?李吉甫回去便责问李德裕,不料小小的李德裕竟然答道:武衡先生身为皇上的左右手,可他竟然不问我应该如何治理国家,如何将社会调理得和谐,却问我读些什么书。读书的事归礼部管,不归他管,他问得不当,所以我不回答他。李吉甫自然将这些话又转告了武衡,反让武衡惭愧得说不出话来。此事一传出,李德裕的名声也就更大了。

唐穆宗即位后,升李德裕为翰林学士。唐穆宗还在当太子的时候,就听说了李德裕的大名,因此即位后就特别优待重用李德裕,但凡号令大典诸等文件,全都出自李德裕之手。经常召见李德裕,给予优厚的赏赐。唐穆宗是个不爱打理朝

政的皇帝,因此朝政风气不好,托人情、走关系、贿赂宦人刺探宫中情报、关托大臣等等,可谓乌烟一片。李德裕针对这些不良风气向皇帝上言道:根据祖上传下来的规矩,是禁止驸马都尉与朝廷主要官员往来的。到了开元时期,这类禁令更为严格。但现在,这些人居然可以大张旗鼓地到宰相和大臣们的家里去。这样做,只会泄漏宫中的秘密,宫里宫外互相勾结罢了。请皇上下个命令,凡有事要找宰相的,只能到中书房去,不准动不动就跑到宰相的家里去。唐穆宗觉得有理,听从了李德裕的这一建议,并升李德裕为中书舍人。没过多久,授李德裕御使中丞。李德裕的建议,本在整顿朝廷的风气。然自唐宪宗时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为相,就因政见不合,与牛僧孺、李宗闵诸大臣各自拉帮结派,形成“牛李党争”。李德裕入仕后,历经宪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、武宗诸朝,他不仅没有化解他父亲留下的这个“牛李党争”,相反,他后来竟成了这一党争中李党的代表人物,陷进了党争的泥淖之中。

二

李德裕能够知民疾苦,因此,在劝阻皇帝的无度挥霍上,起了不少好的作用。

唐敬宗就是一个侈用无度的皇帝。他下诏要浙西上贡脂盥妆具,李德裕就上书表示了

强烈的反对意见。李德裕指出,当时的国家库存已经不多,常用经费缺乏,而军队又等着钱用。在这种时候还要叫浙西上贡脂盥妆具,光是银子的花费就需二万二千两,黄金一百三十两。这样的浪费,已是国力所不能承受的。而敢于向皇帝提出这种反对意见的,当时就只有李德裕一人。后来,唐敬宗又下诏,要上贡盘缘绦千匹,又是李德裕上书反对。李德裕的这道奏章写得很委婉,是用唐敬宗的祖先做榜样来规劝唐敬宗的。李德裕说:唐太宗巡视到凉州时,见有名鹰,就要地方官李大亮敬献。李大亮上书劝阻了。唐太宗不仅不生气,还嘉奖了李大亮。玄宗时,派使者到江南收捕名鸟,汴州刺史倪若水上书劝阻,即受到采纳。这两位祖宗能够听从良臣的意见,难道只有这两位祖宗手下有良臣,当今的皇上您就没有良臣吗?当然不是。主要是在位的人挡住了下面的意见,不是皇上您听不进良言啊。这番马屁拍得唐敬宗很舒服,唐敬宗果然下诏停止了上贡。

李德裕在奏请肃清党派的奏章中,对于如何识别正人与党人的见解,是很有见地的。唐武宗时,他身为门下侍郎,同中书门下平章事,即是当上了宰相。他对唐武宗上书说:首先是要分清正直之臣还是奸邪之臣,然后对正直之臣委以职权,这样,国家就好治理了。我曾对

先帝(文宗)讲过这样的道理,可惜没有被采纳。正直之臣将小人叫作奸邪之人,反过来,那些小人又何尝不是将正直之臣也叫作奸邪之人的呢?那么,怎样才能将真正的正直之臣和小人区分开来呢?请让我用事物来打个比喻吧。像松柏这种树,独立生长,伟岸挺拔,无需对任何其它树种依靠。萝茑就不行了,它柔弱不能自立,必须依附其它的树木才能长得起来。所以,正直的大臣一门心思忠于王事,没有闲工夫去拉帮结党,而奸邪的小人则必须拉帮结党,便于串通一气蒙蔽上面。以此去辨别正直之臣和奸邪小人,就很清楚了。

但李德裕毕竟是李党的代表人物,他要依靠李党的人,李党的人也要攀附于他。于是,他也就有了所谓为图私利而拉帮结派与志同道合共辅朝政的见解。他说,孔子、颜回和子贡诸人互相称誉,大禹、后稷和皋陶交好,他们不算朋党,而共工、欢兜之间的关系,则是朋党关系。他说,君子之间忠于国则同心,闻于义则同志,互相之间不图私利。而小人之间的交往,则是为了互相遮蔽以达到谋私的目的,而为了谋私而组成的这类关系,就是朋党关系。李德裕的道理不错,只是在实际中,这番冠冕堂皇的理论,成了李党结党的借口。

武宗时,牛党一派的给事中韦弘质受人指使上奏说,宰

相的权力太大了,不应该再兼管钱粮方面的事务。对此,李德裕进行了激烈的反驳。而李德裕的反驳意见,也可让我们看出他的施政方略。李德裕上奏皇帝说:管仲是非常懂得治国之道的,他就说过:国家最贵重的宝器,莫过于法令。法令重,君王就尊贵,君王尊贵,国家就安康。治理天下的根本,没有什么比法令更重要。因此管仲规定:私自减损法令的,处死;私自增加法令的,处死;有令不行的,处死;留令不发的,处死;不服从命令的,处死。犯这五种罪行的,不得赦免。管仲又说,法令出于上而下面议论是否可行,这是上面的威严不被下面人员所尊重的表现。大和年后,这种不良的风气越来越浓。法令出自于上,而下面说长道短,这种不良风气不加以制止,就没有办法治理国家了。匡衡说,大臣是国家的股肱,是百姓瞻仰的,是君王慎重选择的。《传》就此注道:在下的轻视在上的,贱人设法对付掌权的大臣,则国家动摇而人心不安。李德裕如此引经据典之后才转入正题道:如今,韦弘质受人指使说什么宰相不能兼管钱粮,就是贱人设法对付掌权的大臣。何况像肖望之这样的汉代名儒,为御使大夫时上奏说:岁首,日月少光,是因臣等有过的。汉宣帝认为这是肖望之有意轻视宰相,而将他下狱有司诘问。贞观时,监察御使陈师合上奏说:人的能

力是有限的,因此一个人不可以总揽几个职位。太宗就批驳说:这是在离间我君臣之间的关系,因此将他发配到了岭外。我认为,宰相若有奸谋隐慝,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向上反映,至于宰相应享有哪些职权,这是君主考虑的事,不是小人所能干预的。自古以来,朝廷上的官员各守其责,考虑问题不要越出了职权范围之外。韦弘质不过是个职位低下的官员罢了,怎么敢以不该他说的话来打搅皇上呢?这是有意轻视宰相。身为宰相的李德裕为反对韦弘质的这一建议如此旁征博引、深恶痛绝,也就看出了他为“党”而“争”的面目。

三

纵观封建时代的历史,李德裕仍旧算得上是个有能力、有进取心的官员。他在出任地方官的任上,都锐意进取,整饬风俗,取得了不错的施政业绩。

早在唐穆宗时期,李德裕出任浙西观察使时,当地民风崇拜鬼神,笃信巫术,偏又瘟疫横行。由于民风不开化,生活水平低,面对瘟疫束手无策,因而老百姓都十分恐惧,以至于自己的父母亲一旦染上了瘟疫,作子女的就只好把他们遗弃,不敢供养医治。李德裕见状,便找来一些年长而又听得进道理的人,给他们讲述孝道,尤其是讲述亲朋好友一旦遭遇灾祸,更应该给予帮助,而不是简单

地遗弃的道理。这些人明白了尽孝、赡养和互相帮助之类的道理后,就让这些人作宣传员,去给他们的乡邻宣传这些道理,同时,以法治做保障,对于屡教不改的人,则给予惩罚。如是几年之后,这些地方落后野蛮的民风民俗都得到了转变。皇帝得知,下诏表扬了李德裕。

李德裕在浙西期间,还处理了一桩棘手的案子。甘露寺主事僧状告前主事私吞寺金若干。这位主事不仅拿出了交割文书为凭,还有一帮子僧人为其作证。前主事僧大呼冤枉,却又拿不出被冤枉的证据。案子到了李德裕之手,李德裕便觉得可疑。有人私下告诉他说,那些交割文书是假的,其实并没有什么金子被私吞了,只是众僧不满前主事僧,故而串通一气诬陷他罢了,只是这个案子被他们搞得人证俱全,要想为前主事僧伸冤却很困难。李德裕听后,说,要搞清楚是否串通一气搞诬陷,是很容易的。他把作证的僧人全部叫来,问他们是不是都看见交给前主事僧的金子了?众僧回答说都看见了。李德裕便将他们一个个分开,然后交给一些软黄泥,让他们捏出给前主事僧的金子模样来。这些僧人事先谁也没有想到李德裕会耍出这么一手,也就不可能进行勾通,于是,众作证的僧人捏出的金块模样自然不可能是一个样子,而是什么样子的都有,他们串通一气作

伪证诬陷前主事僧的事,也就水落石出了。

唐太和四年,李德裕坐镇剑南西川,也为当地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。那时,每年都需要从内地运粮食到边境供应戍边的将士,但旧的制度却不合情理。按旧制,运赡黎、嵩州的粮食,从嘉州、眉州起运,经阳山江,到达大度,再由此分发给戍边的将士。在时间上,则是在盛夏进行。这一条路道路崎岖,多瘴毒,因此,运送粮食的挑夫们经常死于道上。李德裕经过一番调查,因地制宜对旧制进行了调整。他改运邛崃、雅安一带的粮食,每年10月起运,在盛夏到来之前运抵目的地。这样一来,路好走了,挑夫们也不再遭受瘴疫的侵害了。

李德裕还改变了那时蜀人一个不好的风气。那时的蜀人,常把自己的女儿卖给人家作妾。李德裕据此订下了一个规矩:凡卖出的女孩儿13岁以上的,则在买家做3年的劳务,不足13岁卖到买家的,则在买家做5年的劳务,劳务期满,女孩儿仍归父母家。这样的规定,对于买卖女孩子,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。李德裕又下令毁掉寺院私建的房屋数千,将腾出来的地分给农民耕种。刘备墓地旁边有一村子叫獠村,这村的男人都剃光头,看去就像和尚一样,而出家人是可免去赋税的,可这些光头男子却又娶妻生子。李德裕了解这一情况

后,就下命令禁止了。经过李德裕的治理,蜀人原来一些不好的风气得到了改变。

四

李德裕所处的时期,正是唐王朝不十分安定的时期。大西北有回鹘、黠戛斯、沙陀、退浑诸部落时附时叛,大西南有南昭蚕食扰边,西边的吐蕃对大唐的边境也常虎视眈眈。内部,藩镇势力坐大。而李德裕在抚边和削弱藩镇诸等事上,都有所建树。

太和四年,李德裕出任西川节度使。李德裕入主西川前,南昭入寇,打败了节度使杜元颖,节度使由郭钊代之。然郭钊的身体不好,常卧病不能视事,结果造成剑南西川一带社会不能安定。李德裕到任时,清溪以下,沫水之左这一大片土地,尽为南昭所有。而杜元颖之被南昭所败,与前节度使韦皋治川措施有关。韦皋对南昭的政策,是以和为主。而为了达到和的目的,韦皋在经济上对南昭十分优惠,甚至还教以战阵之法。南昭坐大,至杜元颖时,遇到一点问题便乘机发难,长驱直入。李德裕接任后,即修城筑寨,整治军队,将消极的议和改为积极的防御。他组织了“雄边子弟”,即从当地人中招募青壮,让他们学习战事,没有边事时,就让他们务农,若有边事,就让他们参战。这些人熟悉地形,又是为保家而战,颇有战斗力。他

又在南昭和吐蕃入侵的必经之路上,组织修筑了杖义城、御侮城、柔远城,恢复了邛崃关,这些关隘易守难攻,巩固了边防。他又改变了以前从内地往边境运送军粮的时间和路线,使边防驻军的供给得到了保障。李德裕这一系列措施颇有成效。南昭和吐蕃不仅不敢再入侵,南昭还主动将之前俘掠去的四千多能工巧匠交还,而吐蕃镇守维州的守将悉怛谋甚至举城来降。李德裕得维州,准备派军接守,然李德裕的死对头牛僧孺眼红了,上报皇帝说,朝廷和吐蕃是订有和约的,因此,应将悉怛谋送回去,以表示朝廷信守和约的诚意。皇帝听从了牛僧孺的建议。牛僧孺这一手,这让李德裕记恨了一辈子。

李德裕平息大西北回鹘人的侵扰也功不可没。回鹘人本来在河套一带居住。唐文宗开成年间,原臣服于回鹘的黠戛斯人反叛,将回鹘人赶出了他们的住地。回鹘人无奈,分成了两支人马逃了出来。一支人马向西南到了吐鲁番一带,并在那里定居了下来,成了定居的民族,即现在的维吾尔族;一支有十多万的人马在乌介可汗的带领下,带着唐宪宗嫁给回鹘崇德可汗的太和公主南下,抵达了阴山脚下,直接威胁着唐王朝。如何对待这支不请自来的回鹘人,朝中有两种意见。一种意见是马上出兵迎敌,另一种意见就是李德裕的反对意

见。李德裕认为,一则回鹘以前对于唐王朝是有功的,如今遇难来附,也还未骚扰边境,这时出兵不合理义,再则就是现时唐王朝驻边的军力,也不足以和回鹘人抗衡。在无正当出兵的理由又不能保证打胜仗的情况下,不应出兵。李德裕建议,按回鹘人的要求给他们一些粮食,让他们安顿下来。但李德裕并不是消极地应对回鹘人,在给粮食让回鹘人安顿下来的同时,他建议朝廷重建边防要塞,修筑道路,加强军备。当回鹘人元气有所恢复而再按捺不住,对唐王朝的边境开始骚扰时,唐王朝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。在李德裕的指挥之下,大败回鹘人。其可汗侥幸逃脱,但几年之后,还是在漠北被捕杀。

唐王朝的末期,不少藩镇尾大不掉。唐武宗会昌三年,昭义镇节度使刘从谏病危,竟擅自让侄子刘稹继任。刘稹自称“留后”,根本就不听朝廷的号令,试图将泽州潞州一带永远变成他刘氏的世袭领地。李德裕上奏道:泽州、潞州属内地,不是河朔等地能相比的。李抱真建立昭义军,功劳不小,但他死后,唐德宗也不让他的儿子继位。等到节度使刘悟死时,由于敬宗怠于朝政,才让刘从谏继任。这刘从谏继任后,常露反叛之心。如今有点小毛病,便擅自让侄子继任。假如此时还不加以讨伐,今后如何能服四方呢?但武宗一时难以下决心,因

为他还不知是否有取胜的把握。李德裕的政治对手们则持反对意见,说什么刘悟对朝廷是有功劳的,因此不应绝了他的后代,又说什么刘从谏军力有十万之众,粮食至少可以支撑十年,因此朝廷不可能取胜,等等。只有李德裕坚持出兵讨伐,并愿立军令状:不胜,则以死抵罪!武宗这才下了决心,并下令:再阻止出兵讨伐的,格杀勿论!在李德裕的指挥下,经过艰苦的征战,终于打败了刘稹。刘稹兵败,其部将郭谊杀了刘稹,拿着刘稹的首级前来投降。武宗问李德裕,如何对待郭谊?李德裕说,刘稹之所以敢于造反,就因为郭谊这样的部下胡乱鼓动。如今刘稹兵败,他又弑祖求荣,像这样的人不杀,就无法惩戒后来的恶人了。武宗说,我也是这个意思,于是杀了郭谊。这次平定刘稹,对于唐王朝的安定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,因此唐武宗要封李德裕为太尉、赵国公,并说:我很遗憾没有更高的官职来酬答你的功劳了!李德裕慌忙谢辞,说:太尉这个职位,自唐兴以来,只七人担任过,就连尚父郭子仪都不敢拜太尉,我怎么敢拜呢?我原受封于赵,能改为卫就很满足了。于是,唐武宗封他为卫国公。

五

李德裕在唐武宗朝,位极人臣,唐武宗对他言听计从。

他在武宗朝的一大动作,就是开展了浩大的灭佛活动。

佛教自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传入中国,就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、开花,至唐王朝时,已是传遍了长城内外,大江南北。毋庸置疑,佛教的传入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充实和发展,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。但就像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,佛教传入中国后,当其发展规模一旦超过了经济条件允许的范畴,就会给社会的发展造成负面的作用,它的发展受到限制,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。因此,佛教在中国的发展,也不是一帆风顺的。“三武灭佛”就给予过佛教灾难性的打击。

所谓“三武灭佛”,是指发起剿灭佛教运动的三个皇帝的称号中,都有一个“武”字,即北魏的太武帝,北周的周武帝,唐朝的唐武宗。唐武宗时大规模的灭佛运动,发生在会昌年间,历史上又称“会昌灭佛”。但李德裕对佛教的打压,在会昌之前就开始了。唐敬宗时,亳州有和尚放言说他们的水可治病,号曰“圣水”。此说辗转相传,不少人不顾路途遥远跑去打水。而喝了“圣水”之后的人,得了病就得像和尚那样不近油荤,故年老抵抗力差的人往往病死。和尚们则借此发财,每斗水卖三十钱,而买了水的人也转手倒卖牟利,互相欺骗利用,如此,每天去倒腾水的人总在数百人以上,造成了地方上的混

乱。李德裕奏请让观察使令狐楚将所谓“圣水”填塞了,才结束了这场“圣水”治病的闹剧。

发展到会昌灭佛,原因则是多方面的,但根本的原因,还是经济上的。唐穆宗即位后,仅皇宫的开销就越来越大,国家财政拮据。与此相反,佛教寺院却越来越富。他们拥有大量的金、银、铜等贵金属制作的佛像和佛教的祭祀用品,这些被占用了的贵金属对于当时严重缺乏货币的经济,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负担。同时,寺院还拥有大量的土地,并以此牟利,却又不向国家上缴任何赋税。不少大地主趁机与寺院勾结,将自己大片的土地名义上施舍给寺院,从而逃避应缴的赋税。寺院还成了青壮百姓逃避兵役和赋税的避难所,因为一旦削发出家,政府就不能再支配他们了。由此可见,佛教在当时的这种发展,已经从根本上危及到了唐王朝。而唐武宗个人偏又只信道教不信佛教,更使得佛教被灭不可避免了。会昌五年,以李德裕为首辅的朝廷终于下令,上等州治可留一寺,长安及洛阳可留两寺,每寺最多只准留三十名僧人,其余的寺院或关闭,或毁坏。多出来的僧尼则令全部还俗。为了贯彻落实这道命令,朝廷派出四名御使巡行天下,督促执行。结果被废寺院四千六百余座,被勒令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,释放奴婢一十五万人及被寺院奴役的普

通老百姓五十余万人,没收良田数千万顷。这次灭佛,国家的收益是十分显著的。会昌末年,全国税户比唐宪宗“元和中兴”时增加了两倍多,是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最兴盛的时期。

唐武宗对李德裕是言听计从,而李德裕在唐武宗朝,也走到了他政治生涯的顶点。可惜唐武宗这个皇帝,一方面灭佛,一方面又痴迷道教,又不听李德裕的一再劝阻而服食丹药,结果在位仅六年,三十三岁时便早早地离开了人世。唐武宗一死,李德裕的政治生涯也就走到了尽头。一朝天子一朝臣。唐宣宗即位后,牛党卷土重来。在举行登基大典时,身为太尉的李德裕手捧皇帝的宝册站在一旁。大典结束后,唐宣宗带着一副诡谲的表情问左右:“刚才站在我身边的是不是李太尉啊?怎么他每看我一眼,我的汗毛就会立起来!”第二天,就罢了李德裕的宰相职位,贬为荆南节度使。不久,李德裕的死敌、牛党骨干白敏中入朝为相。自此,李德裕就被一贬再贬,一直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,唐懿宗三年死于崖州任上,享年六十三岁。李德裕最终还是成了党争的牺牲品。

(作者单位:贵州省文联)